

● 辛亥百年纪念

民国初年的广州教育

李穗梅

内容提要:

辛亥革命后,广州作为广东省城,在教育方面作了诸多改革。钟荣光先生曾在1912年至1913年担任广东教育司司长,其书稿《广东人之广东》介绍了广东军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情况。本文借助该书稿,参详其他史料,略以还原民国初年的广州教育情况。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地响应。广东于同年11月9日成立了军政府,军政府下设教育部等多个部门。教育部负责管理全省的学政,由丘逢甲、叶夏声出任教育部正副部长。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广东教育部正副部长改由饶芙裳、杨寿昌出任,同时教育部改设教育司。同年5月,教育司副司长钟荣光先生担任司长一职。1913年,钟荣光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赴美国,在赴美船上写下了《广东人之广东》书稿,书中介绍了广东军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情况,从中可窥民国初年的广东军政府在改革封建社会弊端方面所作的努力。教育是社会改良的重中之重,钟荣光历经实践,体会良多,故全文中关于教育的着墨也最多。广州是省会城市,其地位不言而喻,而军政府建立之初,其行政之达也以省会为主。本文借助钟荣光的书稿及其他史料,略以还原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的广州教育情况。

一、教育管理机构的设立——广州督学局

军政府建立后,撤去广东各县的劝学所,教育一职“责成于县知事”^[1]。钟荣光有感知事为一县民政长官,分身乏术,仅依赖一名教育科员无法专心办学,遂提议设立解

决各地学务的机关——督学局。全省范围内，广州督学局最早开办，成立于1912年6月，由原南武中学校长何剑吴出任局长，职能是“市内小学，全归其主管，并大行社会教育”^[2]。广州督学局成立后“即分划市内学区，调查学龄儿童，编制公立市小学名称次第”^[3]。何剑吴“亲往公私各小学校及私塾视察，督令改良。公立学校教员之不称职者撤换之，私立学校之办理腐败，屡令不改者闭之”。^[4]到1912年12月止，广州公立小学40所，私立小学80多所，私塾达790余个，仅在私塾就读的学生达18371人^[5]。在督学局的指导下，广州各公私立小学校长发起私塾改良会，按教育部颁布的《整顿私塾》办法，把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教科书融合三字经、千字文等同时教授，以补充小学教育的不足。但督学局11月遭裁撤，直到1921年才再度恢复。

二、实行新的学制——壬子癸丑学制

民国初期，广州是教育部规定的全国五个学区之一。如何确立新的学制，是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之关键。新学制未确立前，钟荣光主张学风取之美国，学制取之法国。1912年9月，由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了一个学校系统，附有15条说明，史称《壬子学制》。至1913年8月，教育部陆续颁布各种学校规程，对新学制进行补充和修改，该学制更倾向于日本学制。它规定：将学堂改称学校，监督改称校长。初等小学为义务教育，可男女同校。中学为普通教育，废止文实分科，改为4年毕业。整个学校系统为18年，初等教育7年，中等教育4年，大学教育连预科6至7年。这个学制为摆脱封建教育体系迈开了重要一步。故广州很快按新学制及教育方案实施起来。首先，一些旧式学堂改为新式学校，如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高等学堂改为省立第一中学、南武学堂改为南武中学、广东法政学堂改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其后，一些教会开办的学堂也纷纷改称学校。除了名称，学制也进行了改造。1916年，岭南学堂升为岭南大学，广州乃至广东有了第一个综合性大学。但这个学制也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以致实行不久，便有新学制的讨论，到20年代终被《壬戌学制》所取代。

关于男女同校，首先在小学推行。直至20年代初，陈独秀主持广东教育，他积极支持省立一中校长袁振英首创中学男女同校。此举受守旧派人士的公然反对。但陈等人坚持，故中学男女同校在广州首创，后逐渐推广至全国。

实行新制教育后,本着“民国男女,人人应有生活之知识技能及健全之体魄”^[6]之目标,在学校内增设了手工缝纫、音乐、烹饪、农业各科,还开设各种运动场。通过体育会、音乐会等完善学生的素质教育。还通过在中学设评议会、恳亲会、学生自治会,协调校长与教员、教员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三、加强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也称平民教育,主要是针对年长失学之辈。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不特保守旧习,无望其自行更新,政府有所改革,且出而反抗,故无论治标治本,非大行社会教育不可”^[7]。广东都督胡汉民也认为“共和国之主权在民,而人民之不识字者,实居大多数,更不知民主政治为何物,余欲专心从事社会教育,并为本党宣传主义”^[8]。革命党人将社会教育摆在重要的位置符合中国国情。广州督学局成立了两所宣传员讲习所,一家在城内,一家在河南(珠江以南)。挑选一些有口才而通文理者,入所练习一月,考取其优者,由政府给以薪水各三月,担负宣讲员。同时开办阅书报社,成立私塾改良会。以上各种的目的是加强成人的教育,以提高国民的素质。

图书馆是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广东提学使曾在广雅书院设立广东图书馆。1911年4月,在广雅书院原址上重设广东省图书馆,委任李茂之为院长,官员若干。1915年10月,教育部颁布《通俗图书馆规程》。同年11月,教育部又颁《图书馆规程》,各计有11条文。此后,各地图书馆均以此为设施准则。1920年广州第一通俗图书馆在南关石基里设立。^[9]

加强通俗读物的管理,首先针对最为普及的日历,粤人又称之为通书。钟荣光认为:“广东人民,受毒之深者,无如坊刻通书。每日皆有凶吉,每事皆有宜忌,闭塞民智,蛊惑人心。”^[10]教育司成立后,要求通书内容改为:“添入世界之新事业,本国之新建设,凡为人民所当知者,附于日历之前后,为模范之本,任人仿效翻印。”^[11]同时,禁止《状元幼学诗》的出版,“因其开口即以名禄思想,动(劝)人为学,大非民国兴学之意”。^[12]另外,改良戏剧、剧本尤其是关于社会教育最要之点,故采取了排演新剧(尤其是白话剧)、改良旧剧、组织模范班、设立优伶学校、设立新舞台、创办新界杂志等措施。于是,出现了“海内通人志士,奔走呼号,或新撰曲本,载在报章;或现

乐说法，粉墨登场；毅力热忱，殊为可感”的场面。

孤儿教育也属社会教育的一种。民国元年，政府将原由慈善机构办理的孤儿院改为公办，命名为广东公立孤儿院抚育院，潘达微出任院长，潘氏为了解决孤儿院的经费，竟将自己母亲遗产房屋一份变卖得款充作院内开支。^[13]

四、师范教育的突破

民国政府成立后，十分重视师范教育。1912年3月19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令教育部通告各省优初级师范开学文》，指出：“顾欲兴办中小学校，非养成多数教员不可；欲养成多数中小学教员，非多设初级优级师范学校不可。”^[14]“通告各省，将已设之优级初级学校一并开学。”^[15]同年5月6日，孙中山又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的演说中强调指出：“中国人数四万万人，此四万万人皆应受教育。然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也。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16]钟荣光也认为“师范为教育之母”。^[17]1912年2月，遵照教育部令，首先将原有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培养中学老师，地址在广州文明路旧贡院内）改名为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这是当时广东仅有的一所高等学校，以培养中学教师为主。钟荣光任职教育司长后，撤换其不作为的监督，改由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唐萱出任校长。唐以西方的方式管理学校，遭攻击离去。同年12月，改由留日教育名家金曾澄任职。设本科（4科）、预科、附中、附小，共有学生800多人。本科设国文、英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等课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六大高等师范学校之一。原清官立女子初级师范学堂改名为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张沅任校长，在校内增开保姆传习所，培养幼稚园师资，是广州地区幼稚师范的最早创办者。还增聘男教员，学生组织自治会等。1915年，停办保姆传习所，增办7个师范讲习所，培养初小师资，规定凡“榜列次劣及半改良各塾师必须报名入所”。到1921年，广州新成立的市政府创办了广州市立师范学校，以原双门底越秀书院旧址为校址，杜定友成为首任校长，招收中学毕业生，一年制^[18]。为改变师范生“练脑不练手”^[19]之通弊，在高等师范学校特设图工教员养成所，在后成立的广州市立师范学校，专设了图工体乐专修科一班。

私立的师范学校则有私立教忠师范学校，由汪兆铨任校长。它原名为教忠师范学

堂，培养小学师资，成立于1906年，是广州市最早成立的一所师范学校。1923年停办师范，改为教忠中学。

五、其他教育措施

1. 设立教育博物馆。教育博物馆设在教育司署内，其搜集新旧教育品，与古今中外书籍及各学校手工图书种种成绩品，陆续陈列馆内，规定时间章程，供人参观，并附设植物园、学校园，“为学校之模范”。

2. 派遣革命党人公费留学。民国后，孙中山指示：“查民国新建，建立游学，而培养人才，实为当务之急。”一些参与革命的青少年要求公费留学，广东教育司制订方案，先由司进行考核，按照其学科程度，评定分数，再由广东都督复选“以果否有功为断，不专在学科之优劣也”。^[20]

民国初年，广州教育成果可以通过两次广东教育大会来体现。1912年和1913年两次两省教育大会在广州召开，由各县督学局长参加。会有单级模范初等小学、多级模范初等小学、演说会、恳亲会、游戏会、音乐会、图画手工陈列所、教科书教育品陈列所、阅书报处等。会员还参观广州市公私学校、宣讲所与自来水塘、铸钱局、造纸厂、教育司署及教育博物馆。大会还安排了白话新剧、活动影画、幻灯影画给会员观看。大会通过这些活动展示出新政府所要倡导的教育理念与形式，即实行“民主国教育”。^[21]

然而，要改良社会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尤其中国封建社会已存在两千多年，一些封建思想、保守的思维方式顽固地惯性地深植人心。辛亥革命后广州进行的教育改良之路崎岖坎坷，如废除学校尊孔运动、撤换不负责任的学校领导和教员、停办不合格的私立学校等都遇到重重困难，教育经费也得不到保障。后又遇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战事频发，广州的教育发展举步维艰。直到20年代广州市政厅成立以后，广州教育才有了真正的大发展。

注 释：

[1] [2] 钟荣光《广东人之广东》，《孙中山研究》（第三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

年, 页 292。

[3] [4] 同注 [1], 页 293。

[5] 《广东教育公报》1911 年第三期, 页 51。

[6] 同注 [1], 页 297。

[7] 同注 [1], 页 294。

[8] 《胡汉民自传》, 《近代史资料》1981 年第 2 期,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 页 67。

[9] 袁征《晚清民国时期广州教育的转型》, 摘自《近代广州教育轨辙》,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8 年, 页 11。

[10] 同注 [1], 页 294。

[11] 同注 [1], 页 294。

[12] 同注 [1], 页 294。

[13] 何国华《民国时期的教育》,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页 258。

[14] 《孙中山全集》, 第二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年, 页 253。

[15] 同注 [14], 页 254。

[16] 同注 [14], 页 358。

[17] 同注 [1], 页 295。

[18] 同注 [3], 页 173 ~ 181。

[19] 同注 [1], 页 296。

[20] 同注 [1], 页 299。

[21] 同注 [1], 页 292。

(作者单位: 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